

控制人口与 发展经济 ②

北京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二)

北京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二）

北京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朝阳区京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40千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册

统一书号：4209·34 定价：2.35元

编者说明

近年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科研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国际交流日渐增多，人们了解国外人口科学、家庭计划、人口与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和状况的要求十分迫切。为此，继1981年编辑出版了《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之后，我们又组织翻译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朱利安·L·西蒙著）、《人口再生产理论与方法》（B. C. 斯捷申科著）、《人口理论史》（J·奥威毕克著）（与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组译）。本书是《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的续集，仍围绕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这个主题，有选择地汇集了我所科研人员及人口科学爱好者翻译的论文与资料。

本书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各种因素；评介了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政策和措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论述了人口与环境、自然资源、收入分配的关系；评述了人口城市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的动因和问题；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与早期适度人口理论的形成；介绍西方家庭形成体系和苏联、东欧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本书，我们约请彭松建同志撰写了中译本序言，对所选各文作了概括性评介和分析。本书各文除署名译者外，还经过罗湘同志校订。但因水平所限，译文欠推敲，书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1985年8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近年来生育率变动趋势和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评介了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政策和措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论述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各种关系，评述了人口城市化的动因和问题，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与适度人口理论的形成，介绍了西方家庭形成体系和苏联、东欧人口发展趋势，说明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本书对于从事人口科学教学、科研和计划生育工作以及其他经济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彭松建(1)

欠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对现有可用经验

数据的评论..... 乌·派克尔·毛尔丁(23)

亚洲生育率下降的格局和侧重于泰国情况的

分析..... 尼布杭·德巴瓦莱(44)

拉丁美洲生育率下降的格局和侧重于哥伦比亚情况的分

析..... 路易·赫尔兰多·奥斯诺瓦(57)

新加坡——生育率迅速转变

的社会..... 詹姆斯·T·福科特和西威-因·科(83)

西欧控制生育率的趋势..... G·卡洛特和J·赫什(121)

日本最近生育率变动的人口学分析..... 伊藤达也(146)

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加里·S·贝克尔(168)

经济人口学的产生..... 大渊 宽(197)

当前宏观经济与人口的相互

关系..... 乔治·J·斯托尼茨(205)

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以及1975—2025年

的经济增长..... 罗纳德·G·里德克(229)

人口与环境..... 阿尔弗雷德·索维(257)

人口因素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

关系..... O·A·米索克(297)

中国台湾省人口城市化与城市问题…………… 唐福藏(313)

农村向城市净移民率的国际比较…………… S·H·波莱斯頓 (332)

南亚和东南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

动性…………… T·G·麦吉(349)

新古典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 大渊 宽(371)

适度人口…………… 埃德温·坎南(380)

适度人口理论…………… 莱昂内尔·罗宾斯(395)

适度人口的途径…………… J·D·皮奇福特(419)

新型性别作用的人口学基

础…………… 金·戴维斯、皮·范登欧威(447)

两种前工业社会家庭形成法则…………… 约翰·赫吉纳尔(471)

苏联、东欧几个国家人口再生产的

动态和特点…………… P·里亚布什金、T·加列茨卡娅(484)

中译本序言

彭松建

本书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1981年编辑出版的《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一书的续集。近二、三十年来，人口问题越来越为世人瞩目，不但学术界对人口问题调查研究，切磋探讨，而且政界、企业界也十分关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纷纷设立专门机构，招徕学者专家，面对人口增长，研究趋势，提出对策，宣传实施，以图控制世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势头。世界范围内如此重视人口问题，乃谓亘古未见。凡此种种，决非有过其实，而是事出有因：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世界人口从1830年的10亿左右增加到1930年的20亿，用了100年，但到1960年又从20亿增加到30亿，只用了30年；接着到1975年又猛增到40亿，只用了短短的15年；现在（1985年）已达49亿。据联合国估计，到200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61亿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下个世纪末，将达到105亿左右。^① 如果从1830年算起，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的时间间隔则是100年、30年、15年、11年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近几十年来，世界总人口的绝对数增加是惊人的，并且

^① 参阅《中国日报》(China Daily)，1984年8月16日。

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与世界人口发展大体相同。如果从清朝初期（1760年）的2亿左右人口算起，到1900年为4亿，1954年为6亿，1969年为8亿，1982年为10亿。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人口每增加2亿的时间间隔为：140年、54年、15年、13年等。如果到200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2亿左右，那么，与1900年相比，10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增加了三倍。对我国人口的这种增长速度，不可不加体察，良策以对之。

世界总人口和我国总人口如此迅速猛增，引起人们的注目是理所当然。然而，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中期，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对人口科学的研究成了禁区，人口研究落后于世，对国外人口科学的介绍和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但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扭转了这种局面，我国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同时，随着对外开放，国际交往的大门打开，在人口科学领域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正因为如此，了解国外的人口科学研究，翻译各种文版的人口科学文献，评介西方的人口理论和各国实行家庭计划控制人口的经验也势在必行，不无益处。

—

人口是一种基本社会现象，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人类为了自身延续，即“种的蕃衍”所进行的生命的生产要经过一个生育过程，蕃衍后代。生育是整个人口过程的起点和重要环节。对生育过程进行调节是控

① 参阅宋健、田雪源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第3页。

制人口的关键。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对人口生产的调节，主要是对生育的调节，因为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人类为了维持自身和后代的生存、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通过劳动从自然界索取满足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

然而，对人口生产的调节，主要是对生育进行调节，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自发的、盲目的和被动的。只有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当进化论、人体生理学和医疗卫生科学产生和发展起来，当唯心论被破除，唯物论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对人类生育的调节才逐步由被动趋向主动，从自发逐步接近一定程度的自觉，但是，从宏观来看，仍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比较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生产。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人口生产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这是由于人们对人口生产自身的规律性，对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对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即使对这些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即使存在着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生产的可能性，对于如何运用这些规律去调节人口生产，如何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认识变成行动，也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口生产的各种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展现出美好的前景。

本书收集的论文和资料有相当部分是论述和介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如何调节人口生产，主要是如何控制生育率的。本书向人们说明，控制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已不是个别国家或个别地区进行的一种活动，而是一种世界潮流。尽

管各国控制生育率的出发点和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某些民间组织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全球节制生育的概貌。人们之所以重视节制生育，这是因为生育是人口过程的起点，生育率是反映育龄妇女生育强度的。从此入手可以找到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原因。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完全可以调节生育。如果想鼓励生育，则出生人数可较多；如果控制生育，则出生人数可较少。人类要控制自身生产的数量，就必须从控制生育着手，以便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正由于生育率是影响人口趋势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育率方面，着重对此进行研究。国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趋势作了许多研究，不但研究发达国家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动因，而且也研究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变动的趋势和促使其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下降趋势，首先是法国的生育率下降，接着是德国、英国，二十世纪初，这种趋势又扩展到了南欧和东欧。人们了解一下法国十九世纪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就可以明了西欧人口增长缓慢的趋势，详见表1。西欧这种生育率下降趋势，到二十世纪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一度出现了“婴儿热”，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从六十年代以来，这种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详见本书第121页。

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业人口减少，人口城市化，人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和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就学和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等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尤其西北欧洲）的家庭形成

表 1 十九世纪法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和自然增长率(%)

期 间	出 生 率	死 亡 率	自 然 增 长 率
1801—1810年	32.0	27.8	4.2
1811—1820年	31.9	26.1	5.8
1821—1830年	31.0	25.1	5.9
1831—1840年	29.0	24.8	4.2
1841—1850年	27.4	23.3	4.1
1851—1860年	26.4	24.0	2.3
1861—1870年	26.4	23.2	3.2
1871—1880年	25.4	24.1	1.3
1881—1890年	23.9	22.1	1.8
1891—1900年	22.1	21.4	0.7

资料来源：皮特·R·科克斯，《人口学》，第5版，1979年，第176页（英文）。

体系和长期避孕传统对降低生育率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西方普遍存在的不是联合家庭，即由两对或更多对有亲属关系的已婚夫妇组成的大家庭，而是简单家庭，又称核心家庭，即只由一对已婚夫妇或加上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在那里，子女结婚后就与父母分居，独立门户，和东方子女结婚后还要住在父母家里是不一样的。这种以简单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形成体系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男女均晚婚，平均初婚年龄高：男性在26岁以上，女性在23岁以上；（2）婚后夫妇共同主管其家庭；（3）年青人婚前必须离家外出谋生，在近代西北欧主要是外出当帮佣；（4）在农村当一家户主年老引退时必须与其继承人签订契约来转让家庭产业。在历史上，这种家庭产业转让根据西方法律，一般只转让给长子，因为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上述家庭形成体系的特点随

着时代的变迁也有一些变化，但作为一种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从上述几个特点，人们可以看到西方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内在动因。

避孕医药史表明，西欧是有避孕传统的，远从十六、七世纪开始，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避孕，以减少出生人数。所谓传统，就是一种思想、一种风俗、一种制度、一种作风一旦形成，就世代相传，形成一种潜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尽管西欧的宗教势力一般都反对避孕和堕胎，但是避孕和堕胎一旦成为西欧许多国家居民的一种习惯，一种习俗，就无形中形成一股潜在的力量。到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潜在的力量与医药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人们不断地研制新的效率更高的避孕药具，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避孕的传统。当今，在西方，人们为了控制生育，使用避孕药具已习以为常，并且这种避孕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这种避孕传统对于降低生育率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家庭形成体系和避孕传统与我们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国长期受儒家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联合家庭，即大家庭较为普遍，甚至可以说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村中居于支配地位。一家几代同堂，即同时有多对已婚夫妇在一起生活。多年来，我国早婚早育已成习俗，即所谓早生儿早得福。这种家庭形成体系不能不导致高生育率。这种状况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有所变化，即家庭规模开始缩小，简单家庭逐渐增多。

我国古代和近代并不是全然没有避孕，在民间也有一些避孕的方法，但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更谈不到形成一种传统。这是由于我国文化科学比较落后，医药卫生科学也比较落后，在广大农村，从前人们对于科学避孕知识和方法几乎

根本不了解,在城市,过去了解现代科学避孕知识和方法的人也不是很多。由于人们不了解科学避孕知识和方法,当然更难谈得上采取避孕措施。这样不能不使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或过多。当然,在七十年代之前,我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因素和贯彻控制人口政策不得力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没有广泛传播科学避孕知识和方法以及没有形成避孕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

近二、三十年,世界总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原因就不在此赘述了。不过,迅速增长的人口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种种困难和人口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亚、非、拉不少国家,在采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同时,也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并且已初见成效。第三世界开始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慢的趋势。比如亚洲的人口增长率已从1965—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25%下降到1975—1979年的19%。拉丁美洲的生育率从1965年到1975年已下降了1/3。在八十年代初,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主要由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加上发达国家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降至大约6%的低水平,并且西北欧已有一些国家人口增长已接近静止,因此,世界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即从1974年的20.3%降至1984年的16.7%。所以,我们说世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势头是好的,是一种世界人口趋向静止的势头。对于世界人口的前景,我们要采取两点论,一方面要看到世界人口基数大,即使增长率下降,其总人口还会有较大的增加,离接近静止的年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不可

放松控制人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世界范围由于控制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率从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这种增长率下降趋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人口增长静止状态是可能出现的。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人口增长前景的忧虑不安可变为较谨慎的乐观。

当然，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口本身运动规律等等。国外不少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致力于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和生育率本身变化规律的研究，已有某些可供借鉴的成果和研究分析方法。不少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的特点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人口政策，对促进生育率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中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其中新加坡在控制人口、实现生育率转变方面颇有特色，似乎有必要在此略加概述。

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城市岛国，全国总和生育率已从1957年的6.5个左右下降到1978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8个子女，即用一代人的时间，生育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变。生育率如此迅速下降，固然同该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不过，直接影响该国生育率变化的是该国人口政策和家庭计划服务规划；间接影响该国生育率变化的是该国的经济条件、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新加坡独立以来，特别是从1965年开始，明确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始终把人口问题当作一个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紧密相关的问题来抓。该国政府提倡每对夫妇严格控制生育子女人数，并把控制人口的思想贯穿到各项经济政策和文化社会政策中去。例如，该国的妇产政策、教育政策、征收

所得税政策、分配住房政策以及其它政策对生育第一胎和第二胎的夫妇予以奖励，对生第一胎或第二胎后立即采取绝育措施的夫妇给予更大的奖励；对生育第三胎或三胎以上的夫妇予以一定的惩罚。拿妇产政策来说，对生育第一胎或第二胎后绝育者可以免收分娩费；而对生育三胎和四胎者则不给产假，并分娩住院费加倍，如此等等。

新加坡从中央政府到基层单位都设立了控制人口的组织机构，通过这些组织机构推行家庭计划服务规划，如采取组织、宣传教育的措施，劝导已婚夫妇尽量采用现代避孕措施，包括劝导育龄妇女怀孕后做人工流产或分娩后做绝育。据统计，新加坡有73%的家庭采取了避孕措施，实行了家庭计划。

新加坡的生育率迅速下降，除了该国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发挥了作用外，该国经济迅速发展，就业人数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增加也起了重要作用。从1960年以来，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是两位数，其中加工制造业增加最快，从1960—1976年平均每年增长18%。这种快速发展的经济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致使妇女在上述期间的就业人数增加了一倍，实际人均收入也翻了一番。就业妇女的生育率比无职业妇女低得多，如新加坡20—29岁年龄组就业妇女平均有1.23个子女，而无职业妇女平均却有2.17个子女。

随着经济发展，新加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人们的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新加坡人口普查资料说明，妇女的文化程度提高，生育的孩子减少。197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受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受中等教育的妇女平均有2.3个孩子，受高等教育的

妇女平均有 1.7 个孩子。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的生育率比只有小学文化的妇女低一半。这就说明，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一档，其生育率就降低一档。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消费方式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居民收入中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降低，而用于娱乐、享受方面的比例上升。1970—1975年，新加坡居民用于娱乐享受的消费支出增长比用于衣食消费支出快四倍。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一般用于三个方面：生存消费支出、发展消费支出和娱乐享受支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从而用于发展和娱乐享受方面的消费支出的比重必然会增加，而用于生存方面的消费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这是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说来，生活方式的进步可能导致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纽带的放松。新加坡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着消费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年青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独立，对父母的依赖性减弱。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鼓励竞争，讲究效率，追求福利，这样导致人们在要孩子和要娱乐享受之间进行选择。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建立，孩子逐渐失去了对父母的经济保障效用，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从而引起人们的生育观和对孩子价值观的变化。即使人们富裕起来以后，也不希望要更多的孩子，因为孩子已成为年青夫妇就业、参加社交活动，外出旅游和参加娱乐活动的障碍。凡此种种都是导致新加坡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因素。应当指出，新加坡所处的环境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的经济发展带有某种特殊性，因而该国生育率下降如此迅速也带有特殊性，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个